

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

关于整理古籍的问题

张 舜 徽

历代学者在整理古籍方面做出了很多出色的成绩，为我们接收文化遗产、阅读往古的典册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所以几千年间的传注家、文献学家们取得的丰硕成果，是应该在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的。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，应该做出超过前人的成绩。这便需要对这一工作有个通盘打算和长久规划。由于我一生钻研文史，长期和古籍打交道，愚夫千虑，或有一得。现在将我所见到的有关整理古籍的问题，提出几点意见如下：

整理古籍的准备工作

1. 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

我国远古的遗文旧事，初但口耳相传，著之竹帛本晚。一部分书，出于周末；一部分书，成于汉初。遗文旧事，经过后人补写成篇，不免有夸大、有虚构，离开实际情况很远，这便出现了文献资料的可靠性问题。所以孟轲在战国时，已叹“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”。（《孟子·尽心篇》）。后来托古作伪的书，一天天多，经过汉代学者刘向、刘歆父子校书秘阁，逐一指出伪托之迹。今天保存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班氏自注的辨伪之言还不少。在著述界既出现了

各种各样的伪书，学者们便需要有辨伪的眼光和学识，才不致为伪书所骗。自从汉代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发凡起例的工作以后，历代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。连唐代文豪韩愈，在自述学文的艰苦过程时也说：“……然后识古书之正伪、与虽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。”（《答李翊书》）很明显地他将古书分成三类：一类是真（正）的；一类是假（伪）的；一类是书虽真而价值不大高（不至）的。可知韩氏平日读书，也认真进行了辨伪工作。经过宋、明、清及近代学者进一步探研，取得的成绩更大。我们今天，必须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作出的精辟结论，对充栋积字的故纸堆，来一次大的清查，是有必要的。近百年前，张之洞在《輶轩语》中说过：“一分真伪，而古书去其半”。的确，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古书，不免望洋兴叹。如果掌握了辨伪的识力，便能鉴别书的价值，有所别择去取，不致空耗岁月，多走弯路，这对节省时间来说，也有极大好处。所以去伪存真，是整理古籍的先决条件之一。其次，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，又须来一次去粗取精的甄审。把那些常见的必读的书，摆在整理的前列；把那些偏僻的比较粗糙的书，放在后面。这样，才能使轻重有别，处理适宜。不至于盲目地进行整理，自乱步骤。其实，有些书随时世迁移，早已失去了它的效用，在今天没有阅览的价值，自可存而不论，不必再整理它。这样的古书，保存在大小书库内，还是很多的，我们必须进行甄审。

2. 校勘之后，写定群书

一般校勘古籍，都只注意在字句异同以及伪、变、衍、脱之迹，这只能说是校书的起码工作。更重要的，在能将文献资料的源流、真伪和写作时代，都能通过校勘弄清楚，再从而进行重新写定的工作。清代学者龚自珍，便曾有写定群经的志愿，这工作是需要人去作的。例如今日通行本的《尚书》五十八篇

（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十三经注疏》内的《尚书》皆是），其中大部分是后人伪造的。经过宋代学者吴棫、朱熹首先怀疑，到清初阎若璩进一步深入研究，举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。写成《尚书古文疏证》，将晚出古文尚书作伪之迹一一揭发，早已成为定案。所以后来解说《尚书》的，便只围绕那比较可信的二十八篇作注释。清末吴汝纶更取《史记》诸书校订二十八篇，注明同异，写成《尚书定本》。这一方法，自可推广到其他书籍。

谈到整理《二十四史》，也是这样。首先宜将后人附加的话，以及错简、衍文、注语窜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现象，加以改正删订，重新写定，这是十分必要的。例如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末称引扬雄评论词赋的话，《屈贾列传》末叙及贾嘉在汉昭帝时列为九卿的事，都是后世钞书的人附加上去的。

《汉书·李广利传》有错简正文六十九字、注文二十八字；《后汉书·郭太传》有七十四字本为《注》中引谢承《后汉书》语，后乃窜入正文；这些，都早已经过去学者一一指出，精确无疑。我们今天仍让这一类的错乱现象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，行吗？《史记》、两《汉书》是人们常翻的书，尚且如此（例子很多，兹特各举其一）。推之其他史籍，情况也是很严重的。至于久经传写，造成文字的缺、夺、讹、衍，以致前后文气不相融贯之处，尤不可胜数。我们应该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探索所得，对《二十四史》正文来一次写定的工作，是完全必要的。其他诸子百家之书，也自然不能例外。有了一套写定的本子以后，再从而进行注释和翻译，读者受益，自然是大得多了。

3. 重新区分古籍的门类

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很长时期内，是用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来区分古籍门类的，至今沿而不改。究竟四部之中，哪些书是

重要的，哪些书是次要的，哪些书是无用的，没有人分析清楚，又何从而辨别其高下浅深，对于整理古籍来说，是一个大难题。为今之计，应该从每一写作的内容实质来区分古籍门类。古籍的大部分，从内容实质来看，大要可分为“著作”、“编述”、“钞纂”三大类。由于作者所投下的劳动不同，书的价值和作用，也就不同。所谓“著作”，在古代要求很高，是专就创造性的写作说的。无论它的内容，是抒情、是纪实、还是说理，由于它们同有一个条件，便是这些内容，都是前人没有说过或记载的，第一次在这部书内出现，这才算是“著作”。所谓“编述”，是在许多可以凭藉的资料的基础上，加以提炼制作的功夫，用新的义例，改编为另一种形式的书籍出现。尽管那里面的内容，不是作者的创造而是从别的书内取来的，但是经过了细密的剪裁、镕铸，把旧材料变成更适用的东西，这便是“编述”。至于“钞纂”，乃是由其他很多书籍中辑录而成。一部《十三经》，如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是“著作”；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便是编述；《尔雅》便是钞纂（辑录汉初众家传注而成）。这样一分，书的内容实质和它的功用便明白了。对浩如烟海的古籍，能从内容实质区分高下浅深，知道哪些书是应该精读的，哪些书是可以略读的，哪些书是仅供翻检的，便直接提高了学者们的识力，对整理古籍，必然会起很大的积极作用。

4. 甄别汇刻诸书的功用

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刻书，每喜汇刻多种古籍成为一书，用数目字标立大名，所谓《十三经》、《廿四史》、《九通》之类皆是。究竟这些汇刻诸书中，每部书的功用如何？是很少有人过问过的。例如《十三经》中的《仪礼》十七篇是记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统治阶级冠、昏、丧、祭、朝、聘、射、乡诸礼仪，无非是一些宾主跪拜、揖让进退等极其烦琐的

繁文缛礼。由于文辞古简，过去学者便苦其难读，读者亦不能尽通。到今天，自然不必希望一般人去阅读它。保存此书，固可从其中考见古代亲族关系、宗教思想、以及统治阶级一切生活方面的享受情况；但这究竟是少数考古学家的事，而不必要求其他知识分子都熟悉它。所以它虽列在《十三经》内，而整理、翻译之功可缓。反之，有些书虽不在《十三经》中，其价值却很大。例如《大戴礼记》的内容，较之《小戴礼记》（即今《十三经》中的《礼记》）却好得多。我们不能因它没有收入《十三经》而蔑视它；相反地要好好整理它。早在清代乾嘉学者中，段玉裁便创立“二十一经”之说，认为要读的重要书籍，本不限于十三部，必须打破《十三经》的旧范围，开拓研读古籍的新领域，这见解在当时是很卓越的。我们今天，更没有理由围着《十三经》兜圈子了。

所谓“十三经”，是在“五经”、“九经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；所谓“二十四史”，是在“十七史”、“二十一史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时代愈后，包括的书愈多，何尝有一定数字！我们今天整理古籍，必须取消这一类的大名，仔细从书的内容实质方面审定书的价值和作用。不能拘守成见，首先肯定凡是收入了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四史》的书都是价值很高、功用很大的书。例如公元1343年3月至1345年10月，不到三年的时间，元代便完成了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的修纂工作，共计七百几十卷。由于草率从事，以致脱落疏漏、重复叠见的地方至多；互相矛盾、彼此牴牾之处，所在皆是。其中《宋史》496卷，尤为芜杂。元末、明、清学者，都想改修它，由于卷帙浩繁，不易动手，也都没有成功，它的缺点依然存在。

至于所谓“九通”，是在所谓“三通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本来，郑樵的《通志》，是通史体例，与杜佑的《通典》、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专详典章制度的书，体例完全不同。封建统治者只看到这三部书同以一个“通”字标题，便合刻在一

起，名为“三通”，已经极不合理。清代乾隆年间，一再续修，成为“九通”。如果论其功用，杜佑《通典》，只分八门，已嫌疏略；马端临分析二十四门，并补充内容方面的缺遗，较《通典》详备多了。今天我们实事求是，从寻找史料的功用出发，《文献通考》和它的几部续编，倒是我们考证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源。我们可以先从《文献通考》正续编整理起。

由此可见，我们今天整理古籍，必须从每部书的内容实质去加甄审，而不可为那些所谓“十三经”、“廿四史”、“九通”等大而无当的标题所吓倒。功用较大的书，可先着手整理，有些要从汇刻本中抽出来使之单行，不必仍旧捆在一起，使人望洋兴叹。这对发挥古籍的作用，提高读者的勇气，是会有好处的。

整理古籍的两种方式

1. 机械地从每部书下手，加以校勘、注释和翻译，成为人人易懂的读物

过去传注家的解经，便是走的这条路，而以汉、宋学者所做工作为最多，并且作出了很大成绩。汉代传注极盛，以郑玄集其成；宋代传注纷起，以朱熹集其成。他们都从校勘入手，然后解释字句，发挥意旨，使古籍渐渐可读。复有“集解”、“集注”、“义疏”、“正义”之类，相继出现，给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。此外如唐初颜师古的注《汉书》，李善的注《文选》，也取得了杰出成就。至于刘宋时裴松之所注《三国志》，后魏时酈道元所注《水经》，又不专与注释字句为事，大量地搜集了遗文旧事，以补充原书的简略、缺漏，使读者能够了解更多的史实，贡献也是很大的。我们今天可以凭借的清代诸儒及近世学者的研究成果，至为繁富；这种优越条

件，远远超过了古人。我们在整理古籍方面，应该做出胜过古人的成绩。除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对书本进行校订、注释之外，还要用现代语言文字，译成人人易懂的读物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

2. 灵活地综合古代文献资料，加以剪裁、熔铸，用当代语言文字编出人人能看的新书

这是两千年前伟大学者司马迁所走的路。他凭借了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料，认真地进行了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工作，加以融会贯通、剪裁熔铸的工夫，将有用的古籍，用汉代语言文字写出来，收入他的巨著——《史记》中。夏、商、周《本纪》成，而《尚书》在其中；春秋列国《世家》成，而《春秋左传》在其中；《孔子世家》、《仲尼弟子列传》成，而论语在其中。都用当时通行的字义，换代了古代的难字、奥义，使读者易于索解。读了他的这部书，无异于读了若干部古籍。这种整理古籍的方式，替人们节省了精力，带来了方便，使来自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的古文献，熔化为一体，编成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宝库。对保存和传递文化遗产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北宋司马光，根据历代旧史，删繁就简，上起战国，下终五代，用北宋语言文字，编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，成为二百九十三卷的大书——《资治通鉴》，也自然是整理古籍的硕果。这样的事实，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还很不少。我们今天，又何尝不可组织人力，综括古代群书，撷取精华，各系事类，用现代语言文字，编成一部内容丰富的新书。我之所以不自量力，很想创新体例，写出包罗很广的《中华人民通史》，自然也是从整理古籍的角度出发，变通义例，初步拟定的一个计划，已经列为几年内整理古籍的重大项目。

整理古籍的组织机构

大规模地组织人力整理古籍，是一件大事，毕竟是一件要下最大决心作长久打算的工作，想把它做好，一定要有个长远的布局和机构的设置。

这件大事，不是召开几次会议所能解决问题的。首先，要由国家设立古籍整理馆，组织一部分人集中到馆内进行专职的工作。有些古籍是要重新编次才能发挥它的作用，有些古籍是要详加译注才能使人明白易晓，二者并行不悖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集中使用，收效必然很大。当然，也不排斥馆外专家们的独自工作，但不可完全把任务摊派到各高等院放去，因为学校别有任务，特别是一些年轻人，未必对整理古籍都感兴趣，即使由组织安排去作，做起来也不安心，效果也就不很好。关于这一点，有慎重考虑的必要。

其次，要筹设古籍整理出版社，专供出版整理成果之用。目前虽有北京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可以承印古籍，但是他们的涉及面广，任务繁重，不可能专为古籍整理服务。就今天我国出版界的设备和条件来看，一部书的出版，因排队积压，可以到多少年。缓不济急，不能及时反映整理古籍的成果。所以在这一事业上，有筹设专门出版社的必要。

